

【国民经济】

转变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探索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2011 年年会观点综述

郑 鑫^{1,2}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2.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本文对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2011 年年会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了综述, 本届年会的议题以资源型城市转型为重点, 同时涉及区际产业转移与承接、区域工业化与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问题, 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 产业转移; 产业转型; 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11)09-0027-09

2011 年 7 月 24 日,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2011 年年会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与新疆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由克拉玛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克拉玛依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新疆油田公司工程咨询中心承办。大会共收到论文 120 余篇, 来自全国各地近 150 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采取主题演讲和专题讨论的方式, 设立了资源型城市转型、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区域科学发展等分论坛, 就区域经济学前沿问题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交流和研讨。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

克拉玛依市副市长赵武生做了“克拉玛依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世界石油城的探索与实践”的主题演讲, 介绍了克拉玛依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实现城市转型的构想与展望。克拉玛依建市 50 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迅猛, 但是作为资源型城市, 仍面临生存环境差、经济结构单一、抵御经济风险能力弱、城市政府职能不完全或不到位、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现实问题。为摆脱资源型城市“矿竭城衰”的“宿命”, 克拉玛依市在油气资源储备还较为丰富的今天就未雨绸缪, 提前着手制定城市转型战略, 提出了立足中国西部, 面向中亚、西亚、南亚, 放眼俄罗斯、非洲, 把克拉玛依打造成“世界石油城”的战略目标。该战略的核心内容是: 建设油气生产、炼油化工、技术服务、机械制造、石油储备、工程教育等“六大基地”, 大力发展金融、信息、旅游“三大新兴产业”, 打造高品质城市、最安全城市“两大平台”, 最终实现由“单一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的转变, 实现克拉玛依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为促进和带动区域加快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他对国家扶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政策提出

[收稿日期] 2011-08-20

[作者简介] 郑鑫(1981—), 男, 河南安阳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建议国家调整有关自然资源开发的税收政策，将资源税更多地留给当地以支持其城市转型战略；二是建议国家制定明确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移援助政策，鼓励资源型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资源型城市；三是建议国家对于资源型城市的扶持要扩大范围，不能只关注处于枯竭期的资源型城市，应该确定一批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城市，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和财政措施，并希望把克拉玛依市打造“世界石油城”的战略规划纳入国家《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规划》，为克拉玛依市的城市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研究员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与新疆的发展”的主题演讲，对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背景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国资源型城市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产业比较单一，城市依靠单一的矿产业；二是中心性不强，城市仅仅是因为有矿，所以聚集了很多人口，与周边区域没有多大的经济关联；三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体，往往是先有企业，后有城市。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资源尚未枯竭的综合发展型城市，包括大同、焦作、淮北等；二是资源已枯竭的产业单一型城市，包括阜新、东川、万山等；三是资源丰富的产业单一型城市，包括金昌、个旧、鄂尔多斯、德兴等。针对各类资源型城市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提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三个方向：一是转型为区域性中心城市，适合于区位条件好、交通便捷、有较大腹地的城市，具备此条件的资源型城市需要同周边的城乡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多元化，并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二是转型为功能性城市，适合于靠近大城市、没有自己独立的腹地、难以成为区域中心的城市，这些资源型城市可以依托大城市，对接大城市，融入大城市，承担大城市的一定功能，并在产业上与大城市形成分工，发展产业集群，实现专业化生产；三是实现异地发展，适合于腹地不大、规模狭小、交通不便、接续替代产业发展困难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大型企业可搬迁到资源丰富的地区谋求发展，同时实现职工随迁，妥善安置退休、病退职工，这些资源型城市的任务不是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而是搞好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关于新疆的发展思路，他提出了几个建议：一是打造天山北坡城市群，促使产业向“北斗星”状布局的天山北坡七大城市集聚；二是培育经济增长极；三是东西合作共建边境经济合作区；四是加大向西开放力度，开拓中亚、南亚和欧洲市场，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研究员做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国家援助政策”的主题演讲，指出资源型城市是一种按职能划分的城市类型，是经济发展初中期阶段的产物，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但目前我国对资源型城市的界定还缺乏统一的标准，并认为当前中国资源型城市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四性一不顺”。“四性”指经济结构单一性（包括产业结构单一、就业结构单一和所有制结构单一）、城市形成的资源性、产业链条的断裂性和城市布局的分散性，“一不顺”指大多数资源型城市仍实行政企合一的体制，造成城矿关系和体制不顺。目前全国2/3的矿山进入了中老年期，1/4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这些资源枯竭城市面临的问题尤为严重，一是产业接替困难，城市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性和资产专用性、劳动力技能刚性等造成产业转型的基础薄弱，非资源型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二是财政包袱沉重，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多，棚户区改造等任务重；三是社会矛盾突出，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大，部分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社会保障任务繁重，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四是环境问题凸显，“三废”排放量大，耕地占用和破坏严重，诱发性地质灾害频发，采矿沉陷区治理和生态恢复任务繁重。他还指出，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产物，将传统发展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五重五轻”，即重生产发展，轻服务和居民生活改善；重重化工业，轻轻纺和高新技术产业；重资源开发，轻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重中央企业，轻地方配套和融合发展。因此，要解决资源型城市的各种问题，就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走转型升级的科学发展之路。

魏后凯研究员指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国家给予适当的援助政策，但目前我国对资源型城市的援助政策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援助标准比较单一，没有对享受援助政策的资格设定综合性判

断标准,主要依靠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和是否存在明显的矿区沉陷、资源枯竭等具体问题进行判断,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二是援助政策尚未形成体系,现有政策多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一事一议”,缺乏从城市综合体角度出发的系统考虑;三是缺乏宏观层面的规划,现有的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规划多是针对具体地区进行编制的,缺乏全国性的资源性城市转型总体规划,容易造成地方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冲突;四是政府间职责分工不明确,中央、省、市三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行为边界都比较模糊,不利于各级政府财政义务的合理划分和地方政府及企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五是尚未建立长效机制,援助机制和补偿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援助政策没有实现制度化;六是监管体系不完善,对援助资金的具体去向、用途和使用效果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管理制度;七是援助政策缺乏明确的法律地位,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暂时性,其实施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的也缺乏严格的法律规定。他提出了我国资源型城市援助政策调整的重点:①尽快启动编制《全国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规划》,明确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目标、实施阶段、方向、重点领域和政府援助政策。②根据资源枯竭、相对衰退、接替产业发展难度、生态环境压力、社会负担、地方财力等标准,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国家支持和重点援助的资源型城市。③政府援助政策支持的重点明确为资源型城市的接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治理、社会建设和保障体系等。④加快建立资源开发利用的补偿机制,重点是改革资源税费征收制度,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基金,并建立产业结构调整专项基金和矿山环保与土地复垦保证金制度。⑤组建专门机构,统筹解决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问题,负责研究制定系统的国家援助规划、援助措施以及政策实施的协调、效果评价等工作。

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蒋晓蕙院长和汤韵讲师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策略的制定首先应从宏观层面出发,寻找城市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其次应依据新的区域发展优势条件,从微观层面出发,确定产业转型的模式,具体包括产业延伸模式、产业更新模式和产业复合模式。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路径进行了讨论。按资源类型划分,煤炭型、石油型和森工型城市的转型发展应先采取产业延伸模式,在此基础上再推动产业更新转型模式;冶金城市则应把转型重点放在产业更新上。按区域类型划分,东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首先应延伸产业链,打造东部地区的能源基地,同时积极承接发达城市的转移产业,降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可利用国家政策,通过发展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以实现经济转型。按发展阶段划分,处于开发期的资源型城市可采取产业延伸模式,加快资源型产业的技术升级;处于繁荣期的资源型城市可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产业复合模式,完善城市产业体系;处于衰退期的资源型城市则应采取产业更新模式,尽快发展替代产业,可借助外力直接将新兴产业植入资源型城市,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再造城市竞争力。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开盛博士等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研究,认为处在资源丰裕期的城市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即可在短期内获得高收益,这往往会降低居民和城市政府对教育投资的动力,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形成了挤出效应,进而使接替产业因缺乏人力资本而难以发展,据此提出促进资源型城市接替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

二、产业转移与承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耀研究员和陈钰博士从工业布局调整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现象。他们分析了我国地区行业产值、产量等指标,发现从2005—2009年,38个主要工业行业中,东部地区除了4个行业在全国的份额略有上升外,其余34个行业的份额都出现了下降,表明东部沿海部分产业在向外转移,转出的主要是资源型产业和家具制造、食品制造、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从东部的工业布局结构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分别有9个和8个行业在全国的份额上升,而环渤海地区有16个行业的份额上升,表明我国产业还呈现出了由珠三角、长三角向环渤海地区转移的“北上”趋势。目前,我国工业布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

各地普遍追求重工业化,结构调整难度大。“十一五”期间,我国重工业化趋势继续延续,截至2009年,全国31个省级地区的重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全部超过了50%,其中23个地区的该比重超过80%,山西和青海两省甚至超过了90%。二是制造业仍主要集中于沿海少数省份,向外转移有阻力。2009年各行业的地理集中度(CR_5)表明,山东、广东、江浙、江苏四省几乎在每个工业行业所占的份额都位列前五位,中西部省份能进入全国前五位的主要是矿产和能源开采类行业,虽然东部产业存在向中西部转移的动力,但东部省份往往优先鼓励产业在省内转移,给制造业的区际转移造成了一定的阻力。三是内陆粗放型增长特征显著,沿海沿江工业污染重。2009年中西部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分别是东部地区的1.76倍和2.21倍,在生产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别;而废水、废气等污染物排放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河北等东部沿海省份,固体废物排放则主要集中在重庆、山西、新疆、贵州、云南等中西部地区,全国水体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四是多数地区工业研发能力不强,新的重复建设苗头出现。2009年高技术产业进出口贸易仍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导,占出口额比重为72.4%,而且外资企业仍是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主体,外商独资企业占高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比重分别为67.5%和60.2%;在新兴产业的培育上,各地区选择的重点行业重叠严重,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已出现投资过热。他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工业布局应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以推动城市群的形成为依托,以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为要求,推动各类区域转型升级,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培育其内生发展能力,引导东部地区产业有序转移。

陈耀研究员将我国产业转移形式按主要动力来源划分为三种类型:成本驱动型、资源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型,并认为国内较为成功的区际产业转移案例多采取了集群式转移的方式。他还对国内区域经济学界对于产业转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认为其难点在于如何使用现有统计数据识别产业转移,并有效地区分出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用较大的产业转移方式,从而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孙久文所长和胡安俊博士从雁阵模式的基本内涵出发,论证了雁阵模式在中国区域间的适用性:一是中国地区间存在巨大的资源禀赋差异,二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三是东部资金正在大规模投向中西部地区。他们使用我国各省级地区接收的境内省外资金作为识别产业转移的指标,对我国产业区际转移现状进行了分析。2005—2010年,中西部地区接收的省外资金增长了2.5—12.8倍不等,说明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规模在高速增长。同期,各承接地接收省外资金年度规模的标准差由264亿元提高到了2032亿元,说明我国区际产业转移是一种“聚集式转移”,承接区域集中度不断提高。此外,他们还认为中西部承接产业等级在提升,投资产业正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第三产业正在成为投资的主要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石碧华副研究员对外商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她通过考察外商投资在我国各地区的数额和行业变化,认为从2007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由集中走向分散,趋于均衡,外商投资“北上”和“西进”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外商投资向中西部的转移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外商投资总量和规模都较小,与东部差距大。二是外商投资于中西部的产业过度集中,主要集中于建材、造纸等传统制造业及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是投资方式和来源较为单一,在方式上以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为主,股份制企业等投资方式所占比重很小;在来源上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来自欧美国家的投资数额较小。四是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均衡,2007年以来,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和广西一直是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最多的省份,这5个省区2009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到西部地区的90%。五是在引资中存在盲目性,缺乏规划指导。六是东部地区外资内迁面临政府性拦蓄。七是存在污染转移问题。她认为国家应加大对外商投资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引导力度。建议尽快编制《西部地区外商投资发展规划》;实行差别化的产业政策,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针对中西部在招商引资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在土地、能

源、财税等方面采取更加优惠灵活的外资政策。

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处副处长田丽副研究员使用地区行业投资额、新开工项目数、产品产量等指标考察了我国纺织产业的布局情况,认为我国纺织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高度集中的同时,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正在加快,但中西部纺织产业发展相对零散,竞争力相对较低,提出中西部应抓住机遇,积极发展纺织整机,带动配套产业发展,实现产业链条整体转移,并加强产业集群和特色区域的建设。

淮海工学院商学院孙军副教授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彦彦博士后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将发生空间分离,他们将生产者服务视为一种投入品,基于 D-S 模型研究了融入空间因素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证明了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规模取决于转移带来的工资成本优势和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空间分离产生的距离成本之间的权衡,为保证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应通过政策调整弱化市场分割带来的负面影响,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并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硬件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郑鑫博士和陈耀研究员指出,原有的产业转移理论模型源自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并没有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他们将运输费用、需求分布等空间变量引入了雁阵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构建出一个基于区位论思想的两地区模型,证明了在考虑空间因素后,生产成本差异并不能构成产业转移的充分条件。他们还使用该模型阐释了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布局形态由集中变为分散、再由分散变为集中的一般过程,并认为该变化过程的快慢可反映产业转移的效率;使用模型推导和案例分析的方法,证明了运输费用的降低和内需的扩大有助于产业转移效率的提高,而地方保护主义则会降低产业转移的效率。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贺胜兵讲师等使用 2010 年和 2011 年普通工人网络招聘工资数据,对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劳动力成本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东西部的工资差距趋于缩小,劳动力成本降低不足以构成驱动沿海企业跨区域大规模转移的充分条件。

兰州商学院经贸学院胡静寅副教授和刘珊珊研究生指出,我国各地区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政府过度让渡职能的现象,如在引进国外自来水厂商时将自来水定价权也转让给了外商,严重侵犯了居民利益。他们设计了评价政府职能让渡的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指标体系对我国各地区进行评价,发现东部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对政府职能的维护情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据此提出西部地区应吸取东部地区的经验,地方政府应合理运用自己的职能,争取承接高附加值、对当地经济发展有正面效应的国际产业,避免过度让渡政府职能。

三、区域工业化与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王钦副研究员和肖红军助理研究员使用人均 GDP、三次产业产值比、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人口城镇化率和第一产业就业占比等五个指标对 2009 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并快速朝工业化后期迈进,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总体上将表现出“重化工业进一步深化、先进制造业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培育和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全面提速”的趋势。他们认为“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将表现在多个方面:在产业层次结构方面表现为淘汰落后与发展先进并举,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表现为兼并重组和企业差异化发展,在产业技术结构方面表现为技术改造与自主创新提速,在产业布局结构方面表现为集聚化发展和差别化调控。“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必须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以及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民良研究员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效和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十一五”时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趋势

明显,表现为:制造业各行业的区域分布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区域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增长趋势已经确立;高新技术制造业成为推动各地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制造业的跨区域产业转移大规模发生;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支撑要素的培育取得进展;不少地区在淘汰制造业落后产能方面有明显进步;各地因地制宜地确定了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同时,我国区域产业发展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一是东南沿海一些轻型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出现了明显的热衷于大钢铁、大化工的建设倾向,导致经济重型化重复建设问题恶化;二是伴随着产业的跨地区转移,内地的环境压力也不断加大;三是部分地区片面地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同于转变生产方式,通过层层分解节能降耗指标到具体企业,忽视了对粗放型消费方式的转变;四是毒奶粉、瘦肉精等安全事件反映出政府对制造业的质量监管不到位。他指出,引导各个地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清楚把握资源禀赋、要素供求、经济优势和环境背景,加快建设国家调控和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新体制,把握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积极力量。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张进铭教授对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和挑战进行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些学者将我国的发展方式誉为“中国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本身却存在严重的负面效应,包括财富累积效应偏弱、产品质量效应堪忧、就业带动效应很小、收入分配效应较差、环境破坏效应过大等。未来“中国模式”还将面临三大严峻挑战:一是有限的资源将难以支持未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二是政府主导的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难以持续,三是缺少高技术和创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难以为继。因此,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适用于未来的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探索新的模式,走科学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梁泳梅博士后等使用基于包含劳动力素质的效率损失法,测算了各地区不同素质层次的劳动力利用效率,发现在我国各类技术等级的劳动力中,高素质劳动力的利用效率低于普通劳动力,利用效率最低的则是中低技术水平劳动力;各地区劳动力素质结构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不同,多数内陆省份对高素质劳动力和中低技术劳动力的利用效率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要提高我国各地区劳动力的利用效率,需要加快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尤其需要为高素质劳动者提供更多的更适合发挥其才能的就业机会。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安果教授使用 Spengler 纵向博弈模型,证明了重化工业阶段东道国对资本化技术的重复引进是稳定均衡,这意味着我国产业技术进步路径将被锁定于外生型,导致产业结构低位固化、在世界资源配置格局中占比减少以及持续创新机会丧失等潜在的中长期风险,要化解这些风险,政府必须从外部干预,破解技术的重复引进循环。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陈雁云副研究员对我国稀土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虽然我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但我国在国际稀土市场却没有定价权,而且国内的无序开采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他认为我国在对稀土初级产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的同时,需要尽快整顿国内稀土产业秩序,促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一是提高稀土产业进入门槛,引导稀土有序生产经营;二是发展稀土循环经济,加强稀土的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和环境管理;三是完善区域稀土产业链,发展稀土高新技术产业群;四是加快稀土企业整合,提高稀土产业发展规模;五是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稀土高端产品研发;六是建立稀土资源储备体系,取得国际话语权。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长德教授对西部民族地区工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呈逆向调整和结构低级化的态势,典型的表现是采掘工业与原材料工业等资源型工业比重持续增大,且资源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程度长期低下,同时高技术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他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解释了这种现象,证明了这种态势是由东中西之间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降低而引发的使产业向核心区集聚的机制造成的。他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并保持住西部民族地区的制造业份额,一是鼓励国有资源型企业把企业总

部迁移到资源所在地,从而提高西部民族地区的支出份额;二是重点改进边缘区内部的基础设施,而不是连通非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基础设施;三是对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实施投资补贴。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闻君副教授和胡序勇副教授认为新疆作为资源富集区,经济增长对资源开发产业的依赖造成了区域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产业竞争力低下,进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非常尖锐。他们提出,一地区的资源富集并不意味着其资源密集型产品就具有竞争优势,新疆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积极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规避“比较优势陷阱”,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喻新安研究员介绍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他认为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完善全国经济布局、形成全国生态屏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核心任务是要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段庆林研究员对宁夏“十二五”时期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认为应争取使呼包银经济区、兰银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把宁夏作为一个以黄河金岸为核心区、固原为次中心的大城市来规划建设。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晓蓉研究员认为甘肃具有发展新能源产业的资源优势 and 区位优势,提出以甘肃为核心,建设“全国重要新能源基地”,建议甘肃以构建新型绿色产业群作为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大目标,用“新能源产业—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三位一体式的发展模式,谋划新能源产业的大发展。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朱丽萌研究员和曹元坤院长对江西省的人口城市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江西省的县域经济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不应过分强调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祝尔娟教授对京津地区产业合作的理论依据、战略机遇和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京津两地可采取互补式、共建式、链接式、联盟式、集团式、配套式、协作式等多种方式实现产业对接,并提出近期京津产业合作可以京津金融合作、北京科技研发与天津现代制造的合作、京津现代物流合作、京津旅游合作等四个方面为切入点。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龚晓菊副教授对促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金融政策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资本市场落后,金融体系不完善且资金大量外流,严重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发展。在对广西、内蒙古地区的金融供需进行了案例分析后,她指出国家金融政策对中西部的支持功能尚未得到有效释放,表现出金融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功能趋于弱化、现行金融体系及政策与地区金融需求不适应、中小企业金融需求仍难满足等问题。为促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发展,需要采取四大金融政策:一是培育完善的金融市场,二是建立健全金融机构体系,三是建立欠发达地区金融改革试验区,四是创新金融工具大力发展风险投资。

四、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陈栋生研究员做了“‘十二五’规划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的大会主题演讲,他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三大战略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实现了由东部“一马当先”到四大板块“协调共进”的根本转变,同时一系列国家级区域规划的出台,与国家各产业规划相辅相成,较好地解决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调问题,为下一步全面推进国土空间格局的科学调整创造了条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黄征学副研究员提出“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容主要包括各地区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空间结构得到优

化、地区间差距保持在适度范围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得到合理有效发挥等四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叶振宇助理研究员介绍了评价区域发展及其协调性的 DAI 分析框架,即区域经济发展在需求、集聚和一体化等三个方面的表现,他使用这一框架分析了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区域发展成效,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区域协调性显著增强。同时,他也提出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东部地区产业和人口过度集聚;二是大量劳动力流出导致中西部地区人口空心化;三是产业转移仍面临障碍和矛盾;四是流动人口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五是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困难。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廖建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李钢副研究员使用我国 31 个省份 2000—2009 年的数据对地区产业结构进行了聚类分析,发现 10 年来我国区域产业分类格局较为固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域资源禀赋的不同,但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步伐在加快,缺乏合理的区域分工。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教授和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建平讲师利用厂商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推导出关于生产成本与集聚经济效益的数学模型,并将集聚经济效益分解成两类,即由要素投入扩大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由各经济主体彼此靠近引起的外部性,使用该模型对我国 2007 年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虽然集聚经济效益对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正面作用,但是其主要来源却有所不同,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受益于来自生产要素投入扩大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其集聚经济效益主要源自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外部性,说明我国总体的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集聚全国的生产要素,这种增长方式是中西部难以复制的。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余川江博士从新经济地理理论和技术互补性理论出发,反驳了“劳动力持续向东部沿海集聚才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有效扩大内需”的观点,认为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的流动减缓了中西部的工业化进程,拉大了区域收入差距,主张通过相关政策的实施创造“软环境”,促使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市转移,以加快中西部工业化步伐,缩小区域差距。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郝寿义教授和南开大学徐刚博士后通过回顾我国历史上的区域发展规划和区域政策,梳理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路的演变过程,认为我国区域发展规划形式和内容在不断丰富,目前已形成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差异化的区域政策体系,以及民族地区对口援助政策。他们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区域发展规划与区域政策应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多种措施推进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二是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出台、实施和评价机制;三是制定与区域发展水平相配套的政策体系;四是进一步完善对口支援政策。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郑长德教授和罗晓芹教授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总体经济效率与空间公平的双赢。他们介绍了将内生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模型相结合的马丁模型,并使用该模型对区域政策效果进行了理论分析,指出不同的区域政策对于总体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两大目标具有不同的效果,传统的转移支付政策或单纯改善区际(区内)交易成本的政策,面临着空间公平与总体经济效率间的权衡,使两个目标难以兼顾,而降低创新成本的政策则可以实现总体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兼得,据此提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深入推进阶段应致力于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主要措施包括给企业 R&D 提供补贴、提升各族人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实现区域内市场一体化、改善地区内部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刘志迎教授使用地区专业化指数对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了测算,认为安徽省的城市与长三角经济圈的城市存在较大的经济联系强度,说明安徽省参与长三角经济圈的分工已经实大于名,建议安徽抓住机遇,系统构建合作机制,实现东向发展。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熊灵讲师等总结了低碳概念的演变和世界低碳城市建设的实践模式

与经验,指出围绕碳减排目标,国际上先后出现了“低碳经济”、“低碳社会”和“低碳城市”的概念,并将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C40)成员的低碳城市建设经验概括为五种模式,即城市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城市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城市空间形态的低碳化、城市基础支撑的低碳化和城市居民行为的低碳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单吉堃副教授认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尚未完成,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增长的势头短期难以改变;二是工业技术水平较低,导致排放强度高;三是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体,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偏高,导致经济的高碳特征明显。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雷仲敏教授等从经济结构、资源产出效率、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四个方面构建了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针对我国低碳城市的发展,提出了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积极扩大自然碳汇、促进碳交易和碳金融、引导推进生活低碳化等建议。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根尧教授等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保护水平、资源消耗水平、污染排放水平、资源循环利用水平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区域产业生态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各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进行了评估,认为我国产业生态化水平呈东、中、西梯度递减分布特征,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相关性。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志刚教授从资源效率、环境质量、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用以对新疆15个地州市进行评价,认为克拉玛依、巴州和乌鲁木齐分列新疆前三位,从全新疆的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来看,环境质量因子的贡献最大,而经济发展因子的贡献最小。

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激宇教授等对安徽省1978—2009年的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安徽省的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满足倒“U”型的曲线关系,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缓解安徽省环境承载压力有积极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全华教授对我国城市水域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外城市水域问题处理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使用工程技术手段只能使城市水域问题得到局部改善,难以扭转整体恶化,建议我国借鉴国外经验,以美化水域景观和开展休闲旅游的方式维护水域治理成果。

Exploring the Way to Transform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Summary of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in 2011

ZHENG Xin^{1,2}

(1.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ASS, Beijing 100836, China;

2.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of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ajor academic viewpoints of 2011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Region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re reviewed. In the confer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was discussed as a key topic. Other hot topics, includ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acquisition between regions, reg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discussed as well. The conference reflects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researches of regional economics in China.

Key Words: resource-based cities; industrial transfe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regional harmoniou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高粮]